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综述

别红暄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综述了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重点和主题。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建国初期建立起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各学科的研究热点。认为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4方面的问题展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比较研究;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的功能研究;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还需加强对地方个案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 当代中国; 户籍制度; 变迁动力机制; 改革目标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 C 912; D 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4)01-0010-06

户籍制度是与每个中国公民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 在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近几年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 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既有直接以当代中国户籍制度为主题的研究, 也有在相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 间接的涉及户籍制度问题。关注的主题涉及多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比较研究, 主要从横向和纵向2个角度, 即将当代中国户籍制度与同一时期的国外或者其他区域的户口管理制度进行比较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户籍制度进行比较。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横向比较研究

蓝海涛从人口流动的角度, 以加拿大为例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类同于中国户籍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 指出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相比差异性超过了相似性, 并认为: 日本的户籍制度与中国相比, 更有利于形成一个公民户籍地位平等、结构完整的社会。作者还比较了城市化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户籍制度, 由于经济结构上的二元性特征, 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工业化过程中, 城乡人口之间几乎无阻碍地自由流动, 普遍产生了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过度城市化病”, 中国则产生了相反的工业化快

于城市化的“欠城市化农村病”。但是不能简单地得出“城市病”一定比“农村病”危害程度严重的结论, 认为应该逐步放弃户籍管理制度调控城市人口流动的“围墙功能”, 转向寻找其他手段来遏制“城市病”^[1]。俞德鹏比较了中国和国外及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户籍制度后认为: 古希腊和古罗马实行等级身份户籍制度, 苏联和东欧实行治安户籍制度, 美国、日本、西欧、印度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实行人口统计的户籍制度^[2]³⁵⁰。张庆五、张云从立法梗概、管理体制、登记内容、签发证书、人口迁移、人口信息6个方面比较了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国外民事登记制度的异同, 认为: 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法制化程度低、管理体制不顺、限制迁移自由、信息化程度低等弊端^[3]。陈成文等比较了中国户籍管理模式与国外的区别: 我国户籍管理制度遵循的是“治民”原则, 而国外遵循的是“便民”原则; 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是多多元的, 国外的户籍管理的功能则主要是登记人口事项, 证明居民身份; 我国的户籍具有世袭性, 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仅在户口管理中不存在身份的不平等, 而且在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里, 也极力避免因身份不同而遭受不平等; 我国实行的是事前迁移制度, 国外是事后迁移制度; 我国户口管理主要依靠行政命令, 国外则靠市场加法制的手段进行人口的管理^[4]。接栋正研究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通行证制度、西欧的民事登记制度、美国的

收稿日期: 2013-03-20

作者简介: 别红暄(1974—), 男, 河南南阳人,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河南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法学博士

社会保障制度,东亚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户籍制度以及拉美和非洲的民事登记制度,在此基础上,从立法建设与立法主义、身份制、人口登记与统计、迁移与居住许可、社会管理的实现途径等方面对境外民事登记制度与我国户籍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5]。

(二)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纵向比较研究

姚秀兰从法律史的角度认为:中国户籍制度经历了4个阶段:先秦是户籍制度的雏形,秦汉至隋唐实行的是封建赋役户籍制,宋元明清实行的是封建职业户籍制,近代以来实行的是警察户籍制^[6]。俞德鹏从社会学的角度,将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分为4类:征赋派役户籍制、世袭身份户籍制、人口统计户籍制、保甲治安户籍制^{[2]302},并进一步将世袭等级身份制分为家族(家庭)等级身份制、国家等级身份制和户籍等级身份制^[7]。蓝海涛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户口的等级性、世袭性、社会治安和人口统计合一,是对传统中国户籍制度的继承^[1]。

总体看,学术界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城乡不公平的户籍制度和传统户籍制度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现行的城乡不公平的户籍制度和国外的户籍制度的重要区别。

二、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才正式确立起来的。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户籍制度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所以,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2个方面: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根源的研究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研究。

(一)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根源研究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原因与建国后我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相关,这被大部分学者所认同。例如,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中,杨云彦从人口学角度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我国工业化的背景下实施的,其目的在于转移农业生产剩余到工业领域,推进国家重工业的发展^[8]。林毅夫等认为:国家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国家发展战略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得以解决的路径所致^[9]。蔡昉认为: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把城乡经济关系变成了计划控制的组成部分,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所以,国家要针对就业问题

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了保证农村中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同时也为了把城市里享受农产品低价格供给的人数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需要从制度上对城乡人口、劳动力流动作出约束,户籍制度由此形成^[10]。袁刚梳理了中国户籍制度的演进过程后认为: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并非意识形态的建构,也非计划经济的产物,从动态的历史看是传统社会管制体制的延续^[11]。温铁军认为:迁移自由失去的原因不是计划经济,而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中苏交恶,苏联停止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后,中国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只能依赖农业剩余^[12]。还有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蓝海涛认为: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形成的根源主要在于“我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孕育的独特历史文化景观和现实国情无法超越千年历史铸就的传统行为”^[11]。肖海英认为: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政治需要有关,但从更深的层次探究,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对人的基本权益的重视的传统有关,中国长期存在的“王者至上”的理念仍然影响着当前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实现^[13]。同样,黄忠顺认为: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我国户籍制渊源深厚的传统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中平等思想的相对贫乏紧密相关。中国目前的户籍改革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思维,这也是导致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根本原因^[14]。除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成因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建立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时的上层政治精英试图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渗透到社会之中;也是在一个刚刚才使多数人摆脱极端贫穷、解决生计和温饱问题的国度里,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必然要让部分人作出牺牲的这种思维逻辑的结果;也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不知不觉地承袭文化历史传统的结果,尽管新政权试图彻底改造传统社会结构。不过,作者认为:尽管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与计划经济逻辑和体制联系密切,但户籍制度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为它没有随计划经济体制的削弱而削弱、随之消失而消失^[15]。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池建宇、杨军雄从制度供求平衡的角度认为:由于户籍制度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供给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而政府在提供这项

供给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限制:政府也是经济人,政府本身由多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组成,政府由一整套的机构组成各级、各系统的机构,对一项制度安排的态度不同,政府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从而导致户籍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16]。徐亚军等把户籍制度看做是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个长期隐含契约,马上废除户籍制度意味着国家面临着就业、人口和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这决定了国家不能自由退出这一契约,因此,只有通过剥除由户籍派生出的特权才能将“退出权”还与国家,最终达到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17]。贺振华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出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央政府、城市管理者、市民和农民博弈的结果。博弈的结果则由各方的谈判能力的强弱所决定,改革的速度则取决于其他方面的改革的进展、市场化改革、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18]。彭希哲认为:从理念上,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决于户籍决策者放弃“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及其相关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工具性目标”,代之以“权利和平等的价值性目标”;改革的进程取决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来流动人口和城市市民多个利益集团多方博弈过程;在技术层面上,改革的成功原则上取决于2个时机:劳动力市场需求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及城市政府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不断提高^[19]。吴开亚、张力运用实证方法,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职能的角度,以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为主题,通过投影寻踪模型、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我国46个样本城市的现行落户条件及其关联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在财权上移、事权下沉的制度大背景下,当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行政手段竞争发展资源时”,“地方财力的提升并不会必然降低城市落户门槛”,户籍制度改革必然具有曲折性和地区不平衡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依赖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运作格局和多个领域改革的互动,这些领域包括发展模式、政府职能、公共财政、收入分配、民众权利等等”^[20]。

总体看,现有的关于城乡不公平的户籍制度的形成原因多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国家战略等角度分析,较为深入的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分析。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形态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仍显不足。

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的功能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功能的研究,主要

包括两大方面,即正功能与负功能。

(一)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的正向功能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丁水木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维持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城市化速度不致超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承受的限度;克服了供应紧缺的严重困难^[21]。万川认为: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和发展至今,起到了证明公民身份,维持治安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22]。彭希哲等认为:必须历史地评价户籍制度的功能和历史功过,而不应当将其妖魔化,在现行户籍制度安排下形成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对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23]。

(二)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的负向功能研究

鉴于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学术界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探析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弊端。学术界关于户籍制度的负功能的研究主要从3个角度入手。

首先,从城乡经济发展角度。谯远、侯铁军认为: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削弱农业自身积累与再生产能力,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24]。张潮忠、刘德敏认为:传统户籍管理制度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的正常流动,不能充分体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导致农业人口的素质低下,严重影响了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也影响了我国农村的二、三产业的发展^[25]。邓海峰、王希扬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一制度所应发挥的基本功能被“抽空”^[26]。辜胜阻等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人为地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不平衡的二元社会和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国家应有计划地推行户籍制度改革^[27]。张士斌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由于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和不足,农民的相对贫困状态将不能得到有效改变,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差距越拉越大,是农民的贫困陷阱^[28]。曹景椿认为: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妨碍人口城镇化的正常进行,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才的使用与开发^[29]。叶建亮运用经济学中改进的“亨利·乔治”模型,分别从户籍制度所内含的对城市公共产品的歧视性分配政策和城市人口控制2个方面进行解析,认为:现行的歧视分配政策和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不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非歧视性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

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才是有效率的户籍政策组合^[30]。

其次,从社会稳定角度。李强通过对城市农民工的个案研究认为:由于二元户籍的存在,农民工对市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并认为:他们与市民的冲突起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31]。俞德鹏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而形成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别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同等因素以及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被不法的城市市民侵犯,都会引发外来民工的不满情绪与心态失衡,以至于引发外来民工犯罪^[32]。杨风禄也认为:农民工犯罪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所导致的城乡隔离的身份^[33]。同样,张雪筠也认为: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就了民工这一独立的社会单元。这部分人在社会地位、社会权利、职业特征乃至居住地上都与城市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隔膜衍生出民工的缺乏归属感、自律性以及对他人的敌视、冷漠极易诱发民工犯罪^[34]。

最后,从城乡公民权利平等的角度,丁水木认为:户籍制度的负面效应形成了具有不同价值与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21]。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安排按血缘和地域界定身份,并赋予某种等级价值,使人人与人处在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是一种户籍歧视,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平等的基本原则^[35]。郭欣根、张宁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36]。甘满堂认为:二元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城市农民工现象,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足以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37]。陆益龙认为:中国社会等级分层结构与中国超稳定的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的超强控制是分不开的^[15]。

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总体增长、城市化角度以及城乡不公平的角度分析,但是对户籍制度的弊端的分析还有待于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的检视。

四、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研究

由于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现行户籍制度的继续运行对农民工的权利、利益的妨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因而,国内围绕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的研究成果颇多。

(一)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学术界基本上形成普遍的共识,那就是要回归户籍制度的本原功能: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管理。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取消城乡差别。黄仁宗通过对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城镇化本身以及改革内生性4个层面的分析,批判了将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定位于城镇化的错误性,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人口迁徙的自由^[38]。刘伯文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实行与自由迁徙相适应的、开放性的、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为基准的管理模式。”^[39]苏志霞、王文禄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还原其户籍制度的本原功能,使之真正成为“方便城乡居民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制度。”^[40]

(二)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

关于当代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问题是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总体看,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其一,“取消说”。这种观点认为:户籍制度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多余的、无益的,故应从根本上取消户籍制度。胡星斗认为:“不能够因为要进行配套制度的改革,因此户籍改革自身速度就减慢”,应该尽快废除户籍,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41]。其二,“统一说”。即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曹景椿认为:改变户口的二元结构,废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划分标准;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取消“户口特权”;加速实现迁移自由、居住自由;从以户为中心的静态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动态管理过渡^[29]。其三,“剥离说”。这种观点认为:现行户籍承载了许多与户籍本身无关的功能,必须逐步剥离。辜胜阻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在总体上应是渐进式的,应先淡化城市偏向,使户籍与社会福利逐步脱钩,通过先改内容后改形式的方式缓和利益冲突,逐步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籍管理制度^[27]。姚秀兰也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废除或弱化。因为历史形成的不同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消除城乡差别,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功能,这决定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42]。

尽管争论不一,但是其争论的背后,其实质是关于狭义与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以及彻底放开户籍会不会导致城市的拥挤,对城市的管理造成巨大的压力^[43]。目前的大部分观点都主张:与我国的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待遇、社会福利不可能一下

脱钩。在目前中国城乡存在着巨大差别,同时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一步到位的户籍制度改革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如有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城市户籍的稀缺与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愿望之间的巨大矛盾,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通过增加城市公共资源供给,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4]。

五、结论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保证了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不断的

固化和强化,其消极作用已经十分明显,而且违背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治理理念,可以说改革迫在眉睫,这些都已经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就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的大方向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回归户籍制度的本原功能,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取消城乡差别。学术界也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我国户籍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为加快推动城镇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个案研究仍比较薄弱,尤其是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应是以后研究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蓝海涛. 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国际比较[J]. 人口与经济, 2000(1): 38-40.
- [2] 俞德鹏. 城乡社会: 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3] 张庆五, 张云. 从国外民事登记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J].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2(3): 21-23.
- [4] 陈成文, 孙中民. 二元还是一元: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2): 30-34.
- [5] 接栋正. 国外民事登记制度及其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2009.
- [6] 姚秀兰. 户籍, 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17-18.
- [7] 俞德鹏. 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3-32.
- [8] 杨云彦. 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4: 50-55.
- [9]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5.
- [10] 蔡昉.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济研究, 2001(12): 41-49.
- [11] 袁刚. 户籍的性质、历史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J]. 学习论坛, 2008(5): 71-75.
- [12] 温铁军. 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J]. 中国改革, 2002(4): 22-23.
- [13] 肖海英. 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的异化及其回归[J]. 浙江社会科学, 2004(3): 121-124.
- [14] 黄忠顺. 当前城市户籍制度问题的文化分析[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 14-17.
- [15] 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 结构与变迁[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 123-130.
- [16] 池建宇, 杨军雄.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03(3): 70-73.
- [17] 徐亚军, 任雄.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困境: 从国家“退出”角度的分析[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06(3): 86-88.
- [18] 贺振华. 户籍制度改革: 一个合作博弈框架内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3(3): 8-12.
- [19] 彭希哲.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3): 1-11.
- [20] 吴开亚, 张力. 发展主义政府与城市落户门槛: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反思[J]. 社会学研究, 2010(6): 58-85.
- [21] 丁水木. 现行户籍制度的功能及其改革走向[J]. 社会学研究, 1992(6): 100-104.
- [22] 万川.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 1999(1): 32-37.
- [23] 彭希哲, 郭秀云. 权利回归与制度重构——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J]. 人口研究, 2007(4): 1-8.
- [24] 谯远, 侯铁军.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规模经营[J]. 人口与经济, 1999(2): 49-53.
- [25] 张潮忠, 刘德敏. 论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J]. 经济体制改革, 1999(S1): 173-175.
- [26] 邓海峰, 王希扬. 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与完善[J]. 中国人口, 2010(7): 97-101.
- [27] 辜胜阻, 成德宁. 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J]. 经济经纬, 1998(1): 49-53.
- [28] 张士斌. 户籍制度与经济增长中的贫困陷阱[J]. 开放导报, 2009(1): 103-106.
- [29] 曹景椿. 加强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J]. 人口研究, 2001(5): 9-17.
- [30] 叶建亮. 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J]. 经济研究, 2006(11): 27-36.

- [31] 李强. 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J]. 社会学研究, 1995(4): 63-67.
- [32] 俞德鹏.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外来民工犯罪[J]. 浙江社会科学, 1999(2): 45-50.
- [33] 杨风禄. 户籍制度改革:成本与收益[J]. 经济学家, 2002(2): 33-37.
- [34] 张雪筠. 心理疏离与民工犯罪[J]. 理论与现代化, 2002(6): 55-58.
- [35] 陆益龙.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J]. 学海, 2001(6): 57-61.
- [36] 郭欣根, 张宁. 现行户籍制度的利弊及改革思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8(5): 141-143.
- [37] 甘满堂. 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J]. 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30-35.
- [38] 黄仁宗. 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价值取向的反思[J]. 中国行政管理, 2003(1): 24-29.
- [39] 刘伯文.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J]. 经济体制改革, 2004(1): 10-14.
- [40] 苏志霞, 王文禄. 论户籍制度的功能定位[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32-37.
- [41] 胡星斗. 中国户籍制度的命运:完善抑或废除[J]. 学术研究, 2009(10): 65-70.
- [42] 姚秀兰. 论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与改革[J]. 法学, 2004(5): 45-54.
- [43] 温铁军. 户改之辩[J]. 小康, 2008(2): 30-32.
- [44] 李志德.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J]. 经济体制改革, 2010(4): 25-29.

Research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E Hong-xu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academic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themes on the contemporar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indicates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PRC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s more and more peasants go into the cities to look for jobs.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country about th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inly revolved around four aspect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ystem, the study of the changing dynamic mechanism, the system function, and the reform goals and the path of the system.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on the contemporary system, but the farther systematic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local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dynamic mechanism of change; target and path of reformation

(责任编辑 刘 健)